臺大中文學報　第二十五期
2006年12月　頁135～152
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

韓文特質形成的背景

——論唐文的兩個傳統

何　寄　澎*

提　　要

本文以作者昔年所拈韓文「設對話、發議論、寄感慨」三特質的觀點爲基準，透過文本地毯式的檢索方式，探本尋源，發現唐文自始即有直切議論與濃厚抒情的傳統，且二者皆有跨體類的情況，則韓文特質之形成，固頗源於此大傳統，非僅汲於安史之亂後之古文家也。文中另抉發一、二課題，如唐人之「以詩爲文」、杜甫古文的特殊性等，均值得繼續探索。

關鍵詞：文體、議論傳統、抒情傳統

本文於95.09.12收稿，95.12.03審查通過。
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Shaping Forces behi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n Yu's Prose: On the Two Traditions of Tang Prose

Ho, Chi-peng*

Abstract

This paper argues that from its very beginnings Tang prose had developed along two different traditions—the lyrical (*shuqing*) and the discursive (*yilun*), and that the two traditions were evident across different genres. To pursue this argument, I conduct a thorough textual analysis of Tang prose based on a theory I propose in previous study, namely, that Han Yu's (766-824) prose i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essential components: dialogue construction (*she duihua*), discursive reasoning (*fa yilun*), and expression of feelings and reflections (*ji gankai*). I demonstrate that other than tracing back to the works of prose writers who emerged after the An Shi Rebellion (756-763), the shaping forces behi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n Yu's prose is best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two grand traditions noted above. In doing so, I also make efforts to identify issues that deserve further scholarly attentions, such as the features of Du Fu's (712-770) prose and the eminent style of "*yishi weiwen*" (emulating poetry in prose writing) found among Tang writers.

Keywords: genres, lyrical (*shuqing*) tradition, discursive (*yilun*) tradition

*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.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韓文特質形成的背景

——論唐文的兩個傳統

何　寄　澎

一、前　　言

昔年我曾撰〈韓愈古文作法探析〉一文，[1] 分碑誌、贈序、雜記、書說、論辨、序跋等六類，逐類析論韓文之作法，從而浮顯韓文之特質。當時所拈舉出的種種歸納，部分爲形式、技法層面，如：重首尾、富轉折、嚴立間架、繁用排比等；部分則牽涉文體、性質層面，如：設對話、發議論、寄感慨等。如今回顧，雖然無論形式、技法層面，無論文體、性質層面，都共同見證韓文之「去陳言」（詳見該文論述），但若吾人考量文體形成與演變的歷時狀況，知兩漢以前文體自由，殊無定制；魏晉以下，純文學觀念產生，文體之制，規範日嚴，降及梁陳，終趨僵固；而後直至韓愈始大解放文體，隨書寫之人、事、情、意，因旨制宜，自在出入於敘事、議論、抒情各體各調之間，[2] 則「去陳

---

[1] 收入拙著：《唐宋古文新探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0 年 5 月）。

[2] 我一直認爲韓以此而打破記、序、論、書、哀祭、墓誌……等各體或當敘事、或當議論、或當抒情之限制，生出一篇篇精彩之具個性作品，乃東坡〈潮州韓文公廟碑〉贊以「文起八代之衰」之眞義。相關論述可參拙作：〈論韓愈之「以詩爲文」——兼論韓文寫作策略之形成及其影響〉，收入《典範的遞承——中國古典詩文論叢》（臺北，文史哲出版社，2002 年 3 月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言」之義雖包含「文體的改創、文意的翻變、文辭的修鍊」三層，[3] 但顯然韓文最值得注目之特質、韓文「去陳言」之核心，厥在「文體的改創」——易言之，在前文所論設對話、發議論、寄感慨諸體[4] 之順其宜而妙用也。由是，論韓文特質，去細取大、去形式而取本質，固不妨要言爲：敘事、議論、抒情三者之融會互用。

韓文對此三者之融會互用，識者皆知，但或不妨仍贅數例略予交代。

以議論言，碑誌類之〈柳子厚墓誌銘〉最稱典型，自「子厚前時少年，勇於爲人」以下一段，實波瀾洶湧之子厚人格論、際遇論、價值論、意志論；而〈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〉更屬一篇沈痛深刻之服食害命論。贈序類則〈送孟東野序〉實乃一篇窮者立命論；〈送浮屠文暢師序〉則爲一篇揚儒貶佛論。雜記類，〈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〉發端即論書記所任之難；〈鄆州谿堂詩并序〉亦發洋洋之議論，析述治功之大小、前後之難易。書記類，〈上宰相書〉論執政者宜長育人才、擢用人才；〈後二十九日復上（宰相）書〉再論今宰相宜以周公爲法。序跋類，〈讀荀〉較論孟、荀、揚三子，明確分出高下；〈讀墨子〉申明儒墨相用，駁斥一般俗說。

以抒情言，碑誌類之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〉，先述交情，再述四十年間哭祖子孫三代之亡，人生無常之慟瀰漫全篇，最爲著例。贈序類，〈送王秀才（含）序〉、〈送董邵南序〉，均有悲人之悲、同情共感之意。[5] 雜記類，〈畫記〉藉物之流落轉徙，而終回原主懷抱，譜出多少人事滄桑之感！〈藍田縣丞廳壁記〉藉人物之自語、對答，以及其掃溉對樹之行爲，現出崔氏抑鬱幽遠之情懷，而韓愈憐才共命之意不難體會，是沈痛自在言外。書說類，〈與孟

[3] 用兵界勇語，見所著：《韓文「載道」與「去陳言」之研究》，臺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5 年 6 月。

[4] 議論、抒情爲一種「文體」，無疑；設對話，實即「記言」，經、子、史皆有之，蓋「敘事」之一體也。

[5] 〈送董邵南序〉一般恆解爲韓婉勸董生勿赴河北，其實全文要旨未必在此。文中連書「董生勉乎哉！」又云：「爲我弔望諸君之墓，觀其市，復有昔日屠狗者乎？」情辭貫串，隱然有傷無同道知己之懷抱也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東野書〉「言無聽也，唱無和也，獨行而無徒也，是非無所與同也！足下知吾心樂否也？」寫二人別後之孤寂感何等沈重！序跋類，〈讀鶡冠子〉、〈讀儀禮〉，前者云：「使其人遇時……功德豈少哉？」「余三讀其辭而悲之」；後者云：「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，嗚呼盛哉！」知二者皆以感慨成文、唱歎求韻也。

以敘事言，善用答問、對話體實韓文之重要面目，碑誌類之〈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〉兩設對話，畢現王氏奇崛疏狂之神情，末再記其求婦，亦透過人物對話，推展情節，讀來匪夷所思，直類唐人傳奇。贈序類，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記李愿之言，托出一個眞正大丈夫的形象；〈送石處士序〉則通篇借人物對話鋪陳出求才者之「誠」與被求者之「義」，而二者果能相與有成之美不書即自見矣。雜記類，則前舉〈畫記〉、〈藍田縣丞廳壁記〉最精彩之段落，均透過言談之設計，強化情境之生動，有如見其人、如聞其聲之效。書說類，〈答劉正夫書〉藉設答問表達自己對文章以及文統的看法；論辨類，〈對禹論〉、〈進學解〉、〈爭臣論〉，莫不設答問，以反覆對話托出主旨。序跋類，則〈張中丞傳後敘〉、〈石鼎聯句詩序〉，前者借對話見張巡、南霽雲之高義；後者通篇對話，狀聲、狀形、狀情、狀意，已然一篇唐人傳奇矣。

綜上所述，固分明可見韓愈是如何興會淋漓地交錯使用敘事、議論、抒情之體，並貫穿其所有作品——此韓文之大破大立也，視爲韓文最重要之特質，絕不爲過。

這種種特質，我昔年所知者，乃自李華以下已漸有見，而元結可能尤堪注目，[6] 唯其仍可視爲韓之「偉鑄」，殆無庸置疑。這種觀點並不算錯，只是忽略了韓之所以成此豐績，恐怕不只是安史之亂以後的古文家爲其闢路開徑有以致之，乃宜更推之於初唐以來文章書寫表現的轉變——在此，除了「對話」的

[6] 例如：李華之文已有意用對話，如〈李夫人傳〉、〈德先生誄〉、〈故左溪大師碑〉等皆是；而元結尤時將敘事、議論、抒情冶於一爐，〈茅閣記〉、〈寒亭記〉等可爲例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繁用，關鍵因素恐需另當別論外，[7] 這個轉變正包括了：議論的直切與抒情的懇摯二者。正因爲有這二種日積漸累的「書法」，並且隱然成爲「傳統」，韓愈乃能水到渠成般的集其大成，而蕭、李、元結等韓愈之先導，自亦仍然受惠於這個「大背景」；以下分別略加申述。

二、唐文議論的傳統

議論之直切，實唐初以來文章鮮明之格調，而肇始於太宗之鼓勵直諫，此中魏徵〈十思疏〉、[8]〈十漸疏〉，[9] 世所熟知，茲不贅引，引馬周〈陳時政疏〉[10] 爲例：

> 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，而積德日淺，固當思隆禹、湯、文、武之道，廣施德化，使恩有餘地，爲子孫立萬代之基，豈欲但令政教無失，以持當年而已！…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，但有黎庶怨叛，聚爲盜賊，其國無不即滅，人主雖欲改悔，未有重能安全者。凡修政教，當修於可修之時，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，則無益者也。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，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，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。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，而幽、厲亦笑殷紂之滅；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、魏之失國；今之視煬帝，亦猶煬帝之視齊、魏也，故京房謂漢元帝云：「臣恐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古」，此言不可不誡也。

此文歷舉時政之憂，援古戒今，諄諄以勸太宗，其志拳拳，其語忠懇而不避直

---

[7] 韓文對話體的繁用，除了有得於先秦諸子及左傳、國語、史記等史傳傳統外，最直接、最關鍵性的影響，恐怕還是來自於與「傳奇」寫作風氣的相激相生；其實「傳奇」正是史傳與志怪的合體、變體。據我檢索所見（雖然仍不全面），中唐以前對話體的運用亦實有之，但並不常見，也不夠精彩生動。

[8] 原文出於《貞觀政要》卷 1〈君道〉，收入《全唐文》卷 139，題作〈論時政疏・第二疏〉。

[9] 原文出於《貞觀政要》卷 10〈愼終〉，收入《全唐文》卷 140。

[10] 《全唐文》卷 155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諱。馬周另有〈諫公主晝婚疏〉，[11] 更爲簡截：

> 臣遠聞朝謁以朝，思相見也；講習以晝，思相成也；燕飲以昃，思相歡也；婚合以夜，思相親也。是以上下有威，內外有規，動息有時，吉凶有儀，先王之教，不可黷也。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，不可爲也。夫卜筮者所以定猶豫、決嫌疑，若黷禮慢經，先王所不用也。

馬周之外，房玄齡、虞世南、岑文本、杜正倫、褚遂良等莫不有同質之作，顯示貞觀朝之直言立論，乃至無事不論，儼然爲一時風氣。事實上，這種風氣一直延續至後代，故陳子昂爲布衣時即有〈諫靈駕入京書〉：[12]

> 臣聞名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，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。故有非常之策者，必待非常之時；有非常之時者，必待非常之主；然後危言正色，抗議直辭，赴湯鑊而不迴，至誅夷而無悔，豈徒欲詭世誇俗，厭生樂死者哉！……陛下不深察始終，獨違群議，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！

後復有〈諫刑書〉、〈諫政理書〉[13] 等。柳伉有〈請誅程元振書〉[14] 直言代宗之過，其言之悍然，試觀此類文字：「陛下若納臣言、行臣所請，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，臣請闔門寸斬，以謝陛下。」；而陸贄亦有〈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〉[15] 分別爲：〈論兩稅之弊需有釐革〉、〈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〉、〈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〉、〈論稅期限迫促〉、〈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〉、〈論兼幷之家私斂重於公稅〉，洋洋萬言，令人動容；贄更有〈論裴延齡姦蠹書〉，[16] 亦六千餘言，語直意切，姑舉一段爲證：

> 陛下以延齡爲能，愚臣以延齡爲罪。能必有跡，罪必有端，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，以表忠賢，按驗其所論之罪，以考虛實，與眾同辨，示人不

[11] 仝前注。
[12] 《全唐文》卷 212 。
[13] 二文俱見《全唐文》卷 213 。
[14] 《全唐文》卷 457 。
[15] 《全唐文》卷 465 。
[16] 《全唐文》卷 466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私？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，是黨邪害直之驗也，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，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，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。……何必忠邪無辨，枉直莫分，董蕆同藏，其臭終勝？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。

打開唐人文集，打開《全唐文》，這種議論文字俯拾皆是。值得反思的是，它們絕無纖芥六朝文之駢儷空洞，乃大有直承漢初賈誼、鼂錯等議論文之勢，彷彿戰國諸子策士之風的再現；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其語直意切、無所忌諱的凌厲表述方式，展現了唐人自始即然的議論風格。這樣的議論面貌，以其代代相承，固形成一種唐文的「傳統」；然則，中唐以下古文大興，散體取代駢體，此一議論傳統理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，孕育了無限新變、發展的生機。明乎此，吾人讀韓愈〈論佛骨表〉、〈禘祫議〉，甚至〈柳子厚墓誌銘〉中之議論等，自不難體會其勇悍激切之所來自也。

事實上，此種代代相承的唐文議論傳統，影響文章跨體、變體的發展，並非僅是一種合理的推想而已。早自太宗朝的呂才，其〈敘宅經〉[17]嚴厲批判近代師巫以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分五姓卜宅吉凶之荒謬，已然以論爲敘。高宗朝王福畤〈錄關子明事〉[18]，通篇以關氏爲核心，借不同人物與之問答推展情節，反覆論「易」道——實即反覆論治道，不僅以論爲錄，其「對話」體的高度運用尤令人印象深刻。其後李嗣眞〈書品序〉[19]以「論書道、書評之不可輕」爲一篇主旨：

故知藝之爲末，信也。雖然，若超吾逸品之才者，亦當夐絕終古，無復繼作也，故斐然有感而作書評。雖不足以對揚王休，宏闡神化，亦名流之美事耳。與夫飽食終日，博奕猶賢，不其遠乎！項籍云：「書足以記姓名。」此狂夫之言也。嗟爾後生，既乏經國之才，又無干城之略，庶幾勉夫斯道哉！

17 《全唐文》卷 160 。
18 《全唐文》卷 161 。
19 《全唐文》卷 164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而員半千〈蜀州青城縣令達奚君神道碑〉[20]除遵碑體之常則，又引達奚之言論爲政之道：

> 君下車布政，推誠待物，舉義壯忠，貶惡除盜。或謂曰：「不迺闊乎？」君謂之曰：「前史有之。舉有義者，所以救貪污無恥也；舉有行者，所以救廢亂失道也；舉廉讓者，所以救分爭也；……今若此皆有，吾何已焉！吾薄劣，實荷榮奬，既承澆競之餘，復當巧詐之盛，若不憲章古道，祖述前修，貞彼傾輸，不遷其軌，必也政成，何望朞月！」

盧照鄰〈對蜀父老問〉[21]以辭賦體之答問托出一己立身處世之道，理辯滔滔，甚爲精采，試觀其中一段：

> 許由去而堯臣不少，善卷逃而舜德不輕。夫周冕雖華，猿猴不之好也；夏屋雖榮，騏驥不之處也。載鼈以車馬，不如放之於藪穴也；樂鷁以鐘鼓，不如栖之於深林也。此數物者，豈惡榮而好辱哉？蓋不失其天眞也。若余者，十五而志於學，四十而無聞焉。……與時上下，與俗推遷。門有張公之霧，突無墨子之煙。雖吾道之窮矣，夫何妨乎浩然！

至若王勃，詩序、贈序甚多，大率描景言情之作，然亦不時有議論說理，〈秋夜於綿州羣官席別薛昇華序〉[22]即是一例，其云：

> 夫神明所貴者道也，天地所寶者才也。故雖陰陽同工，宇宙戮力，山川崩騰以作氣，星象磊落以降精，終不能五百年而生二賢也，故曰：才難。

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，王勃此篇頗有濃厚別情，但此一別情乃以前述之議論托出，且議論、抒情二者更相揉相生、相激相應，韻致特殊，頗堪玩味。

其餘如張說〈貞節君碑〉[23]記事之外，以議論成頌贊美陽鴻，甚爲動人：

> 君子以爲，急友成哀，高義也；臨危抗節，秉禮也；矯寇違禍，明知也；保邑匿勳，近仁也。義以利物，智以周身，禮以和眾，仁以安人。道有五

[20] 《全唐文》卷 165 。
[21] 《全唐文》卷 167 。
[22] 《全唐文》卷 182 。
[23] 《全唐文》卷 226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> 常，鴻擅其四；武有七德，鴻秉其二。大慮克就之爲貞，好廉自克之謂節，粵若夫子，可謚爲貞節也。

孫逖〈太子舍人王公墓誌銘〉[24]亦機軸彷彿，其中有如下之文論王無競平生遭遇：

> 工文則學必從之，故登麟臺、侍龍樓也；好直則威必濟之，故吏京邑、秉天憲也；行高則眾必疵之，故陷非罪、謫殊方也。噫！良工能爲（□而不能爲）順，君子能爲道而不能爲容。士師黜，宣尼困，屈原逐，賈生憤，公其近之矣。

綜上而觀，自初唐以來，無論敘（序）、錄、碑銘、贈序各體，莫不有議論出入其間，甚且爲一篇之要穴，固已豐富各體本然形、質之面貌而新變矣。此中尚未將書（信）體列入，蓋書（信）之爲用，苟非抒懷即爲議論——唐人尤其如此，大體篇篇皆然，檢之易見，自無庸贅述。至於記體，原多囿於宮、觀、寺、佛像等對象，故頗入制式，甚少可觀。但自李華之師孫逖以降，廳壁記之作遙出，[25]論各種職官之責分，兼及理治之道，遂開記體脫舊制變新貌之契機，此中李華〈中書政事堂記〉[26]以凜然嚴正、鏗鏘響亮之論，[27]傳誦千古，可謂先導之代表。吾人觀顏眞卿〈送福建觀察使高寬仁序〉[28]有云：

> 國家設觀察使，即古州牧部使之職，代朝廷班導風化而宣布德意，振舉萬事而沙汰百吏者也。民俗之舒慘，兵賦之調發，刑獄之冤濫，政治之得失，皆得以觀察而行之，其任可謂重矣。

---

24 《全唐文》卷 313 。

25 孫逖有〈吏部尚書壁記〉、〈鴻臚少卿壁記〉，而李白亦有〈袞州任城縣令廳壁記〉，三文殆爲唐人最早的廳壁記。自此之後，廳壁記多如雨後春筍矣。

26 《全唐文》卷 316 。

27 李華此文不妨錄二段以見梗概：「君不可以枉道於天，反道於地，覆道於社稷，無道於黎元，此堂得以議之。……兵不可以擅興，權不可以擅與，貨不可以擅蓄，王澤不可以擅奪，君恩不可以擅間，私讎不可以擅報，公爵不可以擅私，此堂得以誅之。……」

28 《全唐文》卷 337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儼然廳壁記作法，可知孫、李等開徑之影響；至元結〈菊圃記〉[29]如此書寫：

> 春陵俗不種菊，前時自遠致之，植於前庭牆下，及再來也，菊已無矣，徘徊舊圃，嗟嘆久之。誰不知菊也方華可賞，在藥品是良藥，為蔬菜是佳蔬，縱須地趨走，猶宜徙植修養，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？於戲！賢人君子自植其身，不可不慎擇所處。一旦遭人不愛重如此菊也，悲傷奈何！於是更為之圃，重畦植之。其地近讌息之堂，吏人不此奔走；近登望之亭，旗旌不此行列。縱參歌妓，菊非可惡之草；使有酒徒，菊為助興之物。為之作記，以託後人。

則敘事、議論、抒懷三者融合無間，且復有寓言之味，固可見記體終於幡然成就其嶄新之格調——自此以下，乃至宋人，皆循此渠矱矣。

總之，議論傳統對唐文的影響絕不單一，實有其轉折多姿的面向，值得吾人體察掌握，而韓文種種「去陳言」的表現，亦必有得於此也。[30]

三、唐文抒情的傳統

除了「儁傑廉悍」「踔厲風發」（用韓愈〈柳子厚墓誌銘〉語）的議論外，唐文自始亦別有一抒情的書寫脈絡，二者隱然並驅，特一外視爲公領域、一內視於私懷抱耳。關於這一點，羅宗強等已有見，其《隋唐五代文學史》[31]云：

> 初唐九十餘年間駢體文發展的一個很突出的特點，便是抒情的傾向。……
>
> 高宗朝文風有一重華美之時期，與上官儀等人詩風相伴，散文創作上出現

[29] 《全唐文》卷 382 。

[30] 兵界勇論唐文之演變已見及諫諍傳統的作用，惜僅止於勾勒諫諍作品本身的遞進，未觸及本文所論整個唐文議論傳統的發展以及其對其他文體的滲透。兵氏之說見其《唐代散文演變關鍵之研究》，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， 2005 年 6 月。

[31] 羅宗強、郝世峰主編，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 1990 年 3 月。文內引文分見該書第三章第二節、第八章第一節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了重抒情、求華美的傾向，這主要表現在「四傑」的駢文寫作上。

又云：

盛唐情調反映到駢體文中，是一種濃烈情思與流麗的美，打破了駢體修辭上的束縛，表現出一種內在的感情力量。

羅氏的眼光是敏銳的，看出自初唐至盛唐，抒情一路是文章書寫的一個重要面相，可惜限於其書之體式，未能細論；而只涉及駢文（雖然他把駢文納入散文），也略有不足。其實，唐初王績之散文已有濃厚抒情氣質，其〈醉鄉記〉、〈無心子傳〉、〈五斗先生傳〉、〈負苓者傳〉，以及〈自撰墓誌銘〉等，[32]都屬寄託之辭，頗寓自身感世、避世之懷抱，從而表現其用舍行藏之道，如〈醉鄉記〉云：

嗟呼！醉鄉氏之俗，豈古華胥氏之國乎？其何以淳寂也如是？今予將遊焉，故為之記。

〈無心子傳〉云：

無心子曰：「爾聞蜚廉氏之馬說乎？昔者蜚廉氏有二馬：一者朱鬣、白毳、龍骼、鳳臆，驟馳如舞，終日不釋鞍，竟以藝死；一者重脛、昂尾、駝頸、貉膝，蹄齧善蹶，棄而散諸野，終年肥遁。是以鳳凰不憎山棲，蛟龍不羞泥蟠，君子不苟潔以罹患，聖人不避穢而養生。」東皐子聞之曰：「善矣！盡矣！不可以加之矣！」。

其後，王勃、楊炯之贈序，雖通體為駢而雅有情致，前者如〈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〉[33]云：

辭故友，謝時人，登鄂坂而迂迴，入邙山而北走。何年風月？三山滄海之春；何處風花？一曲青溪之路。賓鴻逐暖，孤飛萬里之中；仙鶴隨雲，直去千年之後。悲夫！光陰難再，子卿殷勤於少卿；風景不殊，趙北相望於洛北。鴛鴦雅什，俱為贈別之資；鸚鵡奇杯，共盡忘憂之酒。

[32] 諸文俱見《全唐文》卷 132 。

[33] 《全唐文》卷 182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後者如〈送徐錄事詩序〉：[34]

> 臨御溝而帳飲，就離亭而出宿，居成別易，坐覺悲來。平原二客，追子高而已遠；河上諸公，餞林宗而有慕。兩鄉風月，萬里江山；修路為下泣之思，長天非寄愁之所。何以處我？戒之必軾；何以贈行？上路不拜。孫子荊傾國之送，豈若是乎？潘安仁金谷之篇，盡於斯矣！

而盧照鄰以身心俱蹇，文多悲苦之音，〈五悲文〉[35]〈釋疾文〉[36]最稱代表，喬象鍾、陳鐵民主編之《唐代文學史》[37]對此有如下的評語：

> 由於他自己有切身感受，他的這些文章不同於一般僅僅鋪敘典故而無實感之作，讀來感人肺腑，千載之下，仍能令人掬一把同情之淚。

至於駱賓王，〈與博昌父老書〉追憶疇昔遊蹤，〈與敘情書〉感傷親友凋零，[38]前者有句：「異鄉春渚，青山載勞，延想秋天白露，幾變光陰，古人云：別易會難，不其然也。……嗚呼！泉壤殊途，幽明永隔，人理危促，天道奚言？感今懷舊，不覺涕之無從也。」後者有云：「詢問子姪，彼亦凋零，永言傷情，增以悲慟！雖死生之分，同盡此途，而存亡之情，豈能無恨？」都流露了濃厚的契闊無常之感。

四傑之後，陳子昂、王維、李白、杜甫等莫不有精彩之抒情文，陳子昂〈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〉[39]以賈誼、崔駰譬況審言，並襯托其不幸遭遇，又通過對別後淒然魂斷的想像渲染依依不捨的別情，末則以杜審言起舞高歌，故作曠達結尾，以樂寫悲而愈見其悲；[40]〈國殤文〉，對為國捐軀的戰士深致哀悼，有〈九歌・國殤〉激憤之調；〈弔塞上翁文〉傷埋骨異域之昔時老翁魂魄

---

34 《全唐文》卷 191 。

35 《全唐文》卷 166 。

36 《全唐文》卷 167 。

37 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 1995 年 12 月。文內引文見其書第六章第二節。

38 二文俱見《全唐文》卷 197 。

39 《全唐文》卷 214 。

40 此處文意採韓理洲說，見所著：《陳子昂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 1988 年 12 月），頁 145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不歸故里，富弔古懷古悽然之感；〈祭率府孫錄事文〉對友人有志不遂，中歲長徂，深致悲恨，則深合〈文心雕龍・哀弔〉「其言惻愴，讀者嘆息」之旨矣。[41] 王維〈山中與裴秀才迪書〉爲音色俱美之抒情文，世所熟悉，但仍可強調者，全文句句景語即句句情語，所謂「情景交融」之境，未有如此深到雅麗者；短短不足二百字之小品，由當下寫至往昔之美好，又由往昔之美好寫至預想之同遊，情思溫潤懇摯，美不勝收。此外，王之贈序亦可注意，頗有慷慨悲歌之味，姑舉〈送鄆州須昌馮少府赴任序〉爲例：

> 予病且憊，歲晚彌獨，家巷衡門，落日秋草。趙服過我，且東其轅，促飯中廚子，不可以蔬食；送車出郭，吾不可以徒行。履以及門，拜於宇下，猶且抱杖延頸，送之以目，城迴樹轉，悲其馬嘶云。

寥寥數語，寫出孤棲不捨的別意，結尾尤富形象感，宛然呈於目前，致情意之流露不僅強烈，抑且饒有回味反覆嘆咏之餘味。[42] 李白一篇〈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〉與王維〈山中與裴秀才迪書〉同爲千古絕唱，其中情思之放曠飄逸自不待言，所異者，王作深婉、李作熱烈而已。白之贈序亦極精彩，多呈現一貫瀟灑亢然之氣質，試觀〈暮春於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〉：

> 繫飛帆於半天，泛渌水於遙海，欲去不去，更聞芳樽。樂雖寰中，趣逸天外，平生酣暢，未若此時。至於清談浩歌，雄筆麗藻，笑飲綠酒，醉揮素琴，余實不愧於古人也。揚袂遠別，何時歸來？想洛陽之秋風，將膾魚以相待，詩可贈遠，無乃闕乎！

完全呈現出李白脫塵絕俗的性情襟抱，離別之意寫得如此朗豁，實曠古所罕有。另有〈澤畔吟序〉則情調幡異：

> 懼姦臣之猜，常韜之於竹簡；酷吏將至，則藏之於名山。前後數四，盡傷卷軸。觀其逸氣頓挫，英風激揚，橫波遺流，騰薄萬古。至於微而彰、婉而麗，悲不自我、興成他人，豈不云怨者之流乎？余覽之愴然，掩卷揮涕，爲之序云。

[41] 子昂三文俱見《全唐文》卷 216 。
[42] 王維二文俱見《全唐文》卷 325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對作者崔氏之「遇時不偶，流離乎沅湘，摧悴於草莽」有深刻的同情共感，殆亦有自我憤懣悲愴在其中。[43] 杜甫向不以文知名，實則其文有值得注意者，〈雜述〉慨張叔卿、孔巢父之不能伸於知己，末有云：「泰山冥冥崒以高，泗水潾潾瀾以清，悠悠友生復何時會于王鎬之京，載飲我濁酒，載呼我爲兄？」情意宛轉眞摯；〈秋述〉實爲一篇贈序，寫魏子以進士調選名隸東天官，來告將行。杜甫當時臥病長安旅次，苦天候霪雨，而車馬之客日稀，魏子來辭，增添杜甫心中多少溫暖？慰藉杜甫多少惆悵寂寥？殆可想而知矣。故全文寫來特有一種既抑鬱又欣然的情韻，而辭采音色更具一種不同於王維幽麗、李白明麗的參差多變之美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最後，〈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碑〉則流露對姑母無限感念之情：

> 甫昔臥病於我諸姑，姑之子又病間，女巫至，曰：「處楹之東南隅者吉。」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，我是用存，而姑之子卒，後乃知之於走使者。……銘而不韻，蓋至情無文，其詞曰：
>
> 嗚呼！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。[44]

由唐初的王績，經四傑、陳子昂，到盛唐的李、杜，我們確實看到唐文一路相承發展的抒情書寫面相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，它們在傳記、書信、序跋、雜記、碑誌、哀祭等各體中都有昭晰動人的表現——這不僅顯示了「抒情性」是唐文很重要的一種不斷發展的特質，也顯示了「抒情」已在唐人手裏「跨體」展演，見證了唐文已然開始新變。文中我所舉的例證都是詩人，這也許不是巧合，相反的，正可能反映了一個事實——唐文的抒情路徑主要由詩人開拓，詩人之文在唐文演變史中的地位應重新評估。而即便它屬於巧合，乃是局於我個人觀之未遍、所見猶少的片面結論，但我仍相信，倘若我們徹底檢索探究唐文，當只會更證明「抒情」確是唐文的一個重要脈絡，而詩人作者在此中的角色也不能忽視。從而我個人也相信，韓以前有如此抒情書寫的傳統，有如

[43] 李白三文俱見《全唐文》卷 349 。
[44] 杜甫三文俱見《全唐文》卷 360 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此抒情創作的新變，故韓乃能乳融轉化成其個人特質——其實，吾人自王績之傳記文，如〈五斗先生傳〉、〈負苓者傳〉等，亦虛亦實，頗寓自身懷抱，韓愈〈太學生何蕃傳〉、〈毛穎傳〉等，以傳抒懷、以傳論世；而杜甫〈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碑〉之銘，以至情無文而不韻，韓愈〈柳子厚墓誌銘〉銘曰：「是惟子厚之室，既固既安，以利其嗣人」與之全然同調等事實觀之，尤易體會前後相承之密切關係也。[45]

四、結　　語

以上所論，係以一種最質實的方式——直接依據唐文所表現的面貌，考察唐文所形成的傳統、所衍生的流變。唯其爲日漸沛然普遍的書寫格調，故後起者的創作自不能不受沾溉、影響，韓愈亦不宜置外。韓之「偉鑄」，固無需因此否認，依舊爲其世罕能匹的特質，但絕不應漠視有此一背景、此一沃壤、此一前軌的存在。我個人撰此小文，最深的感受是：自唐文自始即有的直切議論，見證唐文何嘗有卑靡可言？唐文實與唐詩相同，自始即已展示新聲、展示其不同於前代的氣象。尤有甚者，學者皆謂宋人好議論，宋之議論勇悍直切，如今看來，唐人何遑多讓！往昔之陳見，固宜修正矣。而自唐文自始即有的抒

[45] 韓愈爲古典傳記文學傳統中重要作手（柳宗元亦然），韓、柳出，傳記文學乃面目一新，而韓、柳之前值得注意的唐代傳記文學作者，唯王績一人而已。（相關論述可參拙作：〈小論東坡的傳記文〉，收入前揭《典範的遞承——中國古典詩文論叢》一書）。至於杜文與韓文之關係猶不止文內所述，杜之〈雜述〉、〈秋述〉，實皆贈序，而不以贈序名，是已有「變體」之意，其中情辭，吾人讀韓之贈序，如〈送齊暠下第序〉、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、〈送牛堪序〉、〈送董邵南序〉、〈送王（含）秀才序〉、〈送王（隕）秀才序〉等，均能感受相似之唱嘆情韻；其文字亦頗刻意參差扭曲，甚有奇崛之風，如〈雜述〉：「是何面目黧黑，常不得飯飽喫，曾未得富家奴？茲敢望縞衣乘軒乎？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？豈新令尹之未汝之知也？由天乎？有命乎？」〈秋述〉：「秋，杜子臥病長安旅次，多雨生魚，青苔及榻，常時車馬之客，舊雨來，新雨不來。」則韓文類似此種句法、氣韻之起伏轉折，尤變本加厲、覽之皆是也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情書寫，亦無非見證唐文之豐采多姿——相應於議論之直切，固一剛一柔、一知性一感性，兩美兼得也。不僅如此，更見證詩之抒情侵入文之領域——所謂「以詩爲文」，固魏晉以下不替之趨勢；[46] 而有唐一代文學，詩、文相濟之事實，殊油然可悟，並啓發吾人宜續作探討也。（在此，陳子昂會成爲唐代詩、文兩方面都被推崇、都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，可能正是一個鮮明的象徵）當然，我同時也更確然、深刻的體認到，有關韓文特質的形成，一定可以再找到各種直接、間接的來源[47]（他家如柳宗元等亦然），只待我們對唐文做更完整而細密的探索——而這正是我們應立志去做的事。

（責任校對：邱培超）

引用書目

一、傳統文獻

清・董誥等編：《全唐文》（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79 年）。

二、近人論著

何寄澎：《典範的遞承——中國古典詩文論叢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2 年3月）。

兵界勇：《韓文「載道」與「去陳言」之研究》，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5 年6月。

---

[46] 關於此，可參閱注 2 拙作：〈論韓愈之以詩爲文——兼論韓文寫作策略之形成及其影響〉第四節的論述。

[47] 如褚遂良〈故漢太史司馬遷侍妾隨清娛墓誌銘〉全文內容但爲隨氏託夢，述身世，乞一言之銘墓，大有志怪、傳奇之風（清人黃本驥《古誌石華》、近人程章燦《石學論叢》均以褚文爲僞託，然推論非盡可從，故仍舊說）；駱賓王之〈在獄詠蟬序〉以及張九齡、王維、張說、顏眞卿等碑誌文，均已綜合運用敘事、議論、抒情，是皆「變體」，有既破且立之功矣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

兵界勇：《唐代散文演變關鍵之研究》，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5年6月。

喬象鍾、陳鐵民主編：《唐代文學史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5年12月）。

韓理洲：《陳子昂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12月）。

羅宗強、郝世峰主編：《隋唐五代文學史》（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0年3月）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